



词科与南宋文学

The *Cik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Southern Song Literary Culture

管 琴 著

非
外
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词科与南宋文学

The *Cik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Southern Song Literary Culture

管 琴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科与南宋文学/管琴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301 - 30029 - 9

I. ①词… II. ①管… III. ①科举制度—关系—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南宋 IV. ①D691.3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5712 号

- 书 名 词科与南宋文学
CIKE YU NANSONG WENXUE
- 著作责任者 管 琴 著
- 责任编辑 徐 迈
-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30029 - 9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010 - 62752015 发行部 010 - 62750672
编辑部 010 - 62752022
-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2.5 印张 392 千字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6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 - 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

序 一

程郁缀

今年入夏时节,管琴君的二胎即将临产。在回苏中娘家分娩前,她给我留下了一部厚厚的书稿,说是修订后的博士论文,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付梓前希望我写一个序。作为导师,自然是义不容辞,情更乐为也。

管琴君本科读的是经济专业,但她对文学却有浓厚的兴趣,且基础甚好;所以本科毕业后毅然决然地报考中国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4年以优异的考分考入我们中文系,跟随我攻读古代文学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勤奋刻苦,认真踏实,硕士阶段主攻方向是唐宋诗词,2007年7月以优秀论文《贺铸词研究》,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读硕春秋三载,相处相知颇深,我见她为人诚笃,专业业务扎实,加之经济学的本科背景为当时北大学报编辑部所急需,所以举荐给学校用人部门,经过严格审查和多方面考察,人事部门决定将她留在《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做编辑工作。入职北大后,她工作勤勤恳恳,态度端正,虚心好学,很快熟悉并适应了学报编辑业务,能够独当一面,担负起组稿和执行编辑的重任。

2009年9月,她又通过了博士研究生考试,跟随我在职攻读唐宋文学的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她既要完成本职工作,又要听课拿学分、收集资料写论文,还收获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那几年她的辛劳可想而知;但她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智慧的安排,各方面都兼顾甚佳,还坚持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撰写论文,陆续发表了《两晋赠答诗体制析论——以四言体和五言体为中心》《论意境与格调的关系及与传统诗学的亲疏——从姜夔词无意境说谈起》等颇有新意的学术论文,硕果颇丰。

进入博士论文撰写阶段后,她有意识地想拓展一下以往的研究范围。我们北大中文系的指导老师,一般不给学生指定博士论文题目,而是指定书目让学生读书,要求经常写读书报告,学生从书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觉得有深入研究的余地且有学术价值的题目,与导师一起商讨、提炼论文题目。我们希望博士论文的题目的内涵要有一定的学术“体量”和“含金量”,不能过小、过窄、过浅,要选择一个经得起反复挖掘、反复开凿的“富矿”,只有这样的“富矿”才能开采出有价值的宝藏。我们希望博士论文所选题目,不仅仅能

写出有新度、有厚度、有深度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最好能够为未来乃至一生的学术研究,确定努力的方向,奠定下第一块含金量丰富的基石。

开始时,管琴并没有确定宋代词科为研究题目;我在她写的读书报告基础上,同意她以“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的研究成果,作为博士论文资格考试的文章。她顺利通过了资格考试,还得到了考试小组老师们的一致好评。受此鼓励,她遂决定以此为基础,继续下功夫阅读有关史料,广泛地收集资料,深入开掘、提炼,反复修改完善,终于撰写成博士论文《词科与南宋文学》。由七位评委组成的博士答辩委员会认为,论文的选题富有学术创新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词科以及与词科有关的词学、词人等概念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细致研究,确定了相关概念的历史内涵,创见多多。诸如:论文指出宋代的词科之名虽源于唐,但设置的初衷及具体考试形式则与唐代有区别;宋代宏词科的兴起与宋代党争导致的应用型人才的缺乏有关;宋代词科中存在一些较为密切的群体关系;等等。论文对词科与理学的关系研究、《词学指南》的研究等,均具有创新性的拓展。论文资料翔实,逻辑严密,文字简洁,行文流畅,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全票通过答辩。

管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圆满完成博士学业后,对书稿进行了细致修订,2017年8月,正式以《词科与南宋文学》为书名,交付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关专家严格审稿,写出的推荐意见认为,这部著作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既具有理论深度,也不乏周密的考证,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探究能力。著作填补了宋代词科考试与宋代文学特别是南宋文学之间关系研究的空白,是一本优秀的书稿。我十分赞同此观点,对此书的付梓,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热情的祝贺!

其实,我对于管琴学术研究方面的具体指导并不多,很多材料的收集和观点的提炼,都是她自己悉心探索的结果;我只是在构建文章框架、安排章节和文章学理等方面,时不时地给一些启发和建议。她留校工作,也是她自身条件和自己努力所致。但她对我却一直十分敬重和由衷感激,她说“感谢老师多年的培养和关怀”,说“自己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都是老师造就的”,“正是因为有您在,我才能够心无旁骛地工作,能够安心地在职读书、生子,踏实地走着人生的每一步”。这些都是她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因而深深地感动了我!管琴为人善良,胸无城府,心地纯净,知道感恩;我为有这样的学生和同事而感到十分欣慰!我总以为一个人如果学会了知恩、感恩、报恩,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品格开始健全起来;我总以为一个人应该有这样那样的素质,但在人的所有素质中,善良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如果把我们的人生

比作是一幅图画,那么,善良就是人生这幅图画最靓丽的底色——管琴的人生图画,正是抹上了这样一层靓丽的底色!现在她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为他们全家高兴,为他们的未来祝福!我相信,她的善良的禀赋和聪颖的基因,一定会传给两个宝宝,从而给她、给他们全家的明天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温馨的人生!

这是管琴的第一本著作,眺望未来,她学术研究的道路还很长,祝愿她以此为新起点,耕耘不辍,年年洒汗水,岁岁有硕果。

文不尽言,言不尽意,仅以此千字小序,聊表寸衷。

2017年10月18日

序 二

钱志熙

管琴博士成《词科与南宋文学》一编,踵述前修,力求开拓,创获甚丰;予曾参与其博士论文开题、答辩等事,对其探索之艰辛、绸缪之勤慎略有所知,故赠稿索序。因贡数端,以叙读后感想,兼当引介之用:

其一曰:此编对词科事实之考证,较前修更为详密。宋代词科,实可溯至有唐。然唐之博学宏词科,实为吏部铨选性质,且所试文体为诗、赋、论。观此,唐之试词科,实为进士试基础上之词臣选拔考试,与进士科实未大异,故进士科亦可称词科。顾宋绍圣以后词科,则为此前唐代博学宏词试之进一步制度化,且其性质亦已发生变化。其因以安石变法,科举罢诗赋而专用经义,以致两制缺才,故专设宏词科。所试文体,专在制、表、诏、檄、露布、颂、铭、箴、记、序等类。要之非缘饰政令,即润色鸿业,实与缘情体物之诗赋为两端。其意之所在,乃重实用而弃浮华也。究其原因,则与时人非议科举试诗赋有关。博士此书,于此际考证颇详,深有助于研治两宋文学之流变。又此编之中,另一着力之处,在于详考自唐至宋“词学”义之沿承及变化。“词学”一词源于六朝,其内涵为比事属辞之辞章之学。至词科成立后,“词学”一义,实与其相表里,其意即为“词科之学”。予以为此实为“词学”涵义之缩小。予旧每疑“词学”一词,实文学之最合适名词。然终究不得流行扩大,致为今世治古文学者之陌生词汇。今读博士此编,得其关键矣。此外,本书所考,如两宋词科之四阶段划分,词科群体及家族性现象、南宋士人修习词科之方式及对于当时学术之影响诸项,以余所知,皆前人所未深究者。以此知作者此编于事实考索之功,有加于前人。

其二曰:两宋词科,前人大体叙述其事实,唯所重仍在制度,至其发生之背景及与文化史、文学史之整体关系,则多稍言既止,未厌人意。以余之体会,非不欲言,实为不易言。此编最为锐意者即在此,作者之甘苦及创获亦多在此。其中如论词科文之道德功能与文体修辞、《词学指南》与南宋文章学观念等,俱能有所发明。至词科与诗、古文、曲子词之关系,作者亦予尽力挖掘。如从“词臣生活与宋调书写”“词科与宋词”等节,可知词科人士虽以应

用文学为尚,而亦预纯文学之风会也。予最所欣赏者,在本编绪论一章论宋人对文“穷而后工”观念之微婉纠正与词科诸人之关系,可谓前人未发之覆。作者更欲于此探讨词科人士文学观念上之共同性表现。其于时人所评“词科习气”之评论,亦颇中肯。其论词科批评与南宋骈文发展一事,着力尤深。夫论两宋文学及其变化,诗词易言,古文次之,骈文最难得其真际。今作者此编,庶几有助于两宋骈文研究之深入。

其三曰:两宋词科大家之成就,向少正面论述。此编于“三洪”、吕祖谦、周必大、真德秀、王应麟之词科文,多作专门讨论。词科之文,本质为属辞比事之学,重于体制之契合与修辞之精到,故不如诗、古文辞之重个性与风格。然作者深入体察,能从词科内部把握各家不同艺术追求。

上述三端,仅举其荦荦大者,已见此书建树之宏矣!

予以为词科之制度化,实两宋文学乃至唐宋文学转变之关键环节。其影响之结果,实在于纯文学与应用文学更加区为两途。此实宋人观念上普遍轻视纯文学态度之结果。词科与经制之学、理学能相融,且导致博学考证之风气,而与纯文学之诗词反而相远,其因似亦在此。宋代词科乃至进士科于纯文学发展之实际影响降低。而纯文学创作,则更趋于在野性质。予观两宋纯文学家群体,由江西诗派至永嘉四灵、江湖诗派,渐趋下降,似亦与此发展趋势不无关系。与此相对,此前所谓大手笔者,常同时为纯文学之大家,至南宋则纯文学大家与词科巨擘渐分两途。观此,则知词科之设立,影响南宋文学格局者甚大。

夫自汉代辞赋兴盛,以敷陈为体,然未甚雕藻。其时书奏铭箴诸应用文体,渐求修辞之工。建安曹、阮等家虽返自然通脱,而两晋以降又反其道,诗赋骈俪,渐至雕藻,终至骈文一体得以形成。然南朝骈体,原为极唯美之辞章艺术,后反饰于应用,乃至官方书判,亦用骈骊成体。至两宋以降,四六殆成专门应用之文体。此乃吾国文学之极特殊现象。欲从艺术角度解释此种现象,唯当求之于可视为中国文学之根本之“辞章”二字。然自近世引进西方文学观念,以形象、虚构等为文学之根本特质,宜乎骈文辞赋之研究不得通轨,蹇蹇难进。今词科、词学及其与普遍文学之关系,亦当深入于辞章根本之中国文学本体中加以探讨。如此,则博士此编虽创获已多,然后续研究,仍大有可为。

南通固为富庶之乡,右文之地。近代以来,名家辈出,俊彩星驰。博士幼长其间,多受熏陶。及长,珥笔北庠,入程公之门,学术日进。肄业之后,虽主衡文之事,而锐志著述不稍懈。平日兼事吟咏,偶见其所作,虽未入古人之

室,而已见修辞之功。此编论词科文学,颇能含咀英华,漱吮艺润;其自行文,亦披条振叶,修辞悦怿,实亦有赖于其辞章修养也。自现代学术专门化之后,文学研究与创作截然分为两事,不知艺而谈艺者多,血指汗颜,观者每多隔膜之恨。今上庠诸子治学之余,兼事风雅。庶几将来之风气,有所转化。此予翹企有望者也。

戊戌春杪,东嘉钱志熙序于燕园。

目 录

序 一	程郁缀 (1)
序 二	钱志熙 (5)
绪 论	(1)
一、研究现状	(15)
二、词学、词人、词臣等相关概念的梳理	(17)
三、“词学”概念的延展与宋代“穷而后工”观念的衍化	(31)
四、研究方法与构架	(46)
第一章 宋代词科综论(上)	(49)
第一节 宋代词科的源流与设置	(49)
第二节 词科考题与文体分类	(69)
第三节 词科之文:道德功能与文体修辞	(86)
第四节 词科与中兴心态	(99)
第二章 宋代词科综论(下)	(104)
第一节 两宋词科的取士与入仕	(104)
第二节 词科进卷与行卷	(115)
第三节 家族与衣钵——南宋词科中的典型群体关系	(119)
第四节 词科的衰落及其政治原因	(128)
第三章 词科与南宋的制诏文	
——以南宋三个阶段的王言书写为中心	(133)
第一节 高宗至孝宗朝“三洪”的家族词学与在朝文学实践	(134)
第二节 孝宗朝周必大的词学体式	(143)
第三节 理宗朝真德秀、洪咨夔的王言书写	(154)
第四节 词科与南宋制诏总论	(163)

第四章 词科批评及南宋骈文的发展导向	(176)
第一节 “习气”界说与南宋“词科习气”的形成	(177)
第二节 “词科体”“词科习气”的形成 ——以吕祖谦、周必大、王应麟为例	(185)
第三节 其他词科批评及永嘉学派	(193)
第四节 词科体与西昆体	(208)
第五节 词科与南宋骈文的演进	(213)
第五章 词科以外的文学体式论略	(225)
第一节 平实与宏博的两种散文路向——以记、序文为例	(225)
第二节 词臣生活与宋调书写——南宋词科士人诗歌综论	(235)
第三节 词科与宋词	(249)
第六章 《词学指南》与南宋后期的文章学观念	(257)
第一节 《玉海》与《词学指南》的产生背景	(258)
第二节 追源溯流的文体分类与典赡详核的文学观	(261)
第三节 《词学指南》与南宋的文章学观念	(264)
第四节 余论：王应麟的通儒追求	(269)
第七章 词科与南宋理学	(282)
第一节 理学家的词学观及部分理学家的词科经历	(282)
第二节 词科士人的理学观	(292)
第三节 词学与理学：杂糅或分裂的理念	(301)
结 语	(311)
附录 两宋词科人士小传	(315)
参考文献	(337)
后 记	(346)

绪 论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于古代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已有相当大的推进,在相关领域中,其中的重要一项即是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研究。20世纪80年代,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①一书发其嚆矢,就唐代进士行卷的若干方面进行考索,探讨有唐一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关系;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②一书则采取文史互证方式,从科举制度与文学在诸多层面上的互动影响展示从文史综合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此后二三十年间,此类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就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而言,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学人论著,或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观照文学思潮,或从具体科举事件着眼揭示宋代知识群体的观念与整体风貌,在科举与文学关系方面取得斐然成果。^③如何在科举与文学的研究领域继续挖掘深入,寻找新的研究点,成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书即选取词科这一科目,围绕宋代词科与文学的关系展开讨论。一般说来,在关于宋代的科举研究中,常举特别是进士科的研究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多,制举与词科既不常设,其得人情况与常举无法相提并论,故而受到的关注较少。不过如果我们还原宋代科举的历史情境,则会发现,词科实际上是宋代尤其是南宋前中期颇为重要的一个科目,在当时受的关注尤其多。本书所论词科,是一个总称,在宋代不同阶段有不同称谓。哲宗绍圣元年(1094)五月,首立宏词科;翌年立宏词科考校格,正式开科取士。徽宗大观四年(1110),将宏词科改为词学兼茂科。南渡以后,词科制度得到延续,高宗绍兴三年(1133),词学兼茂科改为博学宏词科;理宗嘉熙二年(1238),另设词学科,降等取士,同时博学宏词科不废。以上科目统称为“词科”。总的说来,

①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其中较著者有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专论北宋科举与文学的则有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近年来随着研究的细化,还出现一些从不同角度论科举与文学的专著,其中包括分时段论述两宋科举与文学(姚红、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科举所考不同文体与文学(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许瑶丽《宋代律赋与科举——一种文学体式的制度浮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词科在两宋前前后后盘桓了一百余年的时间。

就其性质而言,词科“是为选拔起草诏诰以代王言的人材而特设的科举考试科目”,^①其设置意图与功能有颇多可注意之处。唐代“词科”原本具备两种含义,一种是指进士科,一种是吏部选科目中的博学宏词科。宋代的词科,其名称袭自唐代,但所试内容大有差别:唐代的博学宏词科主要试以诗、赋、论,所试内容接近常举科目;而宋代词科所试,绍圣二年定为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诫谕、序、记等九种;大观四年除去檄书,增入制诏;绍兴三年,词科固定试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等十二种文体。追溯词科其源,实因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执政,一意反元祐之法,恢复熙宁经义取士制度,朝廷应用文章的写作人才相形见绌。为补此之失,立宏词科吸纳专门人才。王安石经义取士后,诗赋既罢,试以词学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词科这里。

词科与南宋四六文的兴盛实有不解之缘。南宋人对词科与文学尤其是四六文的关系,已有所体察。谢伋《四六谈麈序》称:“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②刘克庄也说:“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③均指出词科与南宋四六之间的关系。现当代学者在论述词科时,也往往指明这一点。民国时期金钜香所著《骈文概论》,书中下的一个判断是:“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若孙觌、滕庾、洪遵、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之伦,在博学(弘辞)[宏词]科,最为杰出,而有文名。”^④南渡之后,除绍兴十三年、绍兴二十七年,臣僚两次建言将经义、诗赋合并一科并各尝试一举外,常举一直沿袭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制度,较为稳定。金氏所说的对骈文施加直接影响的科举科目,主要就是词科。当今文史学者在论及词科与文学的关系时,对此也有较为统一的结论。如祝尚书先生认为:“在北宋古文运动之后处于弱势地位的骈文,能够在南宋复兴,主要推动力正是词科。”^⑤曾枣庄先生也指出:“宋代四六文的鼎盛期则是南北宋之际及南宋前期,这是古文与骈文并兴的时代,四六文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出现了大量总结四六文写作经验的四

① 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张希清撰:《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38页。

② 谢伋:《四六谈麈序》,《四六谈麈》,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③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退庵集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④ 金钜香:《骈文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9~110页。

⑤ 祝尚书:《宋代词科制度考论》,《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158页。

六话。这与博学宏词科的设置有关。”^①关于词科对南宋骈文起到的推动作用,学界的看法基本上一致的,没有太多争议。

那么,为何词科会与南宋骈文的兴盛发生关联呢?首先在于,词科所试,包括制、表、箴、颂等应用文体,主要是以四六文写作。四六文虽然常常受到宋人的批评,但它在当时是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中必须用到的文体,如洪迈所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搢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②吴奂然称:“施之著述则古文可尚,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③这一现象到南宋尤为突出。20 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往往忽略四六文,有些学者认为,四六文的命运,自唐以来,“受了古文作家们最大的攻击,以至于销声匿迹”,^④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据曾枣庄先生统计,吕祖谦《宋文鉴》所选各种四六作品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魏齐贤、叶棻合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四六文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⑤近人所编《全宋文》,其中收录的大量制诏、表启、碑铭、颂箴等以四六文为主的应用性文章,也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词科之文是应时代对四六应用文之迫切需求而设,恰如绍兴六年喻樗上奏所云,词科所试“实为有用之文”,^⑥与四六文性质接近,故词科的兴盛也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其次,针对词科之学的理论研究在南宋也已展开,《四六话》作者王铨出身于词学家族,杨困道《云庄四六余话》也多引词科应考文章,对之进行品评。这些都是词科对南宋四六文话的直接影响。另如王应麟《词学指南》,对十二种词科文体的写作程式和写作技巧有所总结,进一步促进了四六文写作的理论总结与提升,本书的第六章对此还有详述。

宋代的四六文与古文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消有长,情形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总的说来,四六文在古文压挤之下并未失去其半边江山,相反却能与之抗衡,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忽视的现象。20 世纪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学界对北宋的古文运动及其对宋代诗文的影响投入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骈文研究则相形见绌。不过,现今学界也在纠正重古文而轻骈文、重北宋而轻南宋这样的学术风向,南宋文学尤其是四六文方面的成果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与四六文资料及内容的丰富相比,目前学界对这部分承载公私等诸多应用层面的四六文的渊源流变、内容内涵、应用形式等研究,已有了一些推进。

① 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4 页。

② 《容斋随笔·容斋三笔》卷八“四六名对”,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517 页。

③ 吴奂然:《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序》,叶棻辑:《圣宋名贤四六丛珠》,明抄本。

④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68 页。

⑤ 曾枣庄:《论宋代的四六文》,《文学遗产》1995 年第 3 期,第 62 页。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〇二,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1927 页。

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中长期延续下来的纯文学的研究思维,使这部分文体的研究,似乎难以超越一般思维所限定的审美范式,许多问题仍然未能解决。例如,文学研究的界线是否不可逾越;在诗、赋等纯文学体裁之外,如何看待像诏敕、公牒、颂箴等情志较为缺乏的应用型文章,它们是否有其文学意义与审美意义,我们应在何种层面上对其进行研究。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制度与文学的研究必然会受到阻碍。如果我们仍然沿袭纯文学的研究思路,遵循以往对纯文学体裁的审美范式研究,不能够将触角向其他应用性较强的文类扩展,那么文学研究的格局势必无法深入。

对制度与文学研究方面审美范式的突破,实际上涉及对制度与文学关联、纽结程度的理解。相关研究的推进又取决于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制度研究的深入,例如与文事、著述相关的唐宋中枢秘书制度(包括翰林制度)、馆阁制度等研究,这方面史学界这些年已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①文学研究应向史学研究借鉴,一是在充分掌握制度史细节的基础上,将单向的、个体的文学行为放在某一制度下来进行研究、观照,将其来龙去脉揭示清楚;二是制度与文学结合起来研究,考察某一制度背后是否蕴含文学需求以及制度对文学与文化的正面塑造与潜在影响。这方面学界在近二三十年内也已出现不少研究成果,较早有傅璇琮先生对唐代翰林学士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又出现宋代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唐代、明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幕府制与文学研究、馆驿制度与文学研究、贬谪与文学研究等等,^②这些研究从各项制度入手,探讨它们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制度与文学的理解。不过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较为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文学研究在尝试超越以审美为根基的纯文学范式的研究,扩展到制度的层面时,文学与制度层面的联结点往往较难把握,结合得也较为粗糙。制度与文学两方面的研究本来是没有干涉、各自为政的,如不能将二者之间关于外部与内部各

① 具体到与本书内容相关的翰林、中枢秘书制度在20世纪的研究成果,可参看杨果《宋代中枢秘书制度史研究述评》一文,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1~294页。

② 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近年来呈方兴未艾之势。其中关于馆阁翰苑与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书,其他还有铨选与文学、幕府与文学、馆驿与文学、贬谪与文学等不同方面的研究,参见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

个层面辨析清楚,从其颉颃共生的关系入手,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关键点就无法把握。

本书的写作则基于以下考虑:制度与文学各自有不同的形成机制与生长环境,它们的交结点在于人本身——制度与文学均是由人创立与创造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实际上与身处制度下的文人的身份与职业密切相关,其中环境的因素不可忽略。具体到宋人身上,这种“环境”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在科举制主导下的文官官僚社会中,宋代士人经由科举这一人才选拔制度进入权力体系,少数人得以幸运地进入政权核心或者文化组织的核心,本书研究的词科,作为一项科举科目,为这部分擅才使藻的文人提供了特殊的入仕渠道。除去文化传统的濡染,这部分士人早年的教育背景、认知视角与生活经历,对他们后来的文学活动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并未随着科举的结束而结束,他们因为占据文官政治集团的中心位置,其为官后的身份,对其文学格局的形成、文学观念的认知、文艺操习的践履等方面,仍然进行着规约和引导。从宏观上说,科举文风的变革会带来文坛的风气转换;从微观上说,在科举社会下,某一士人个体早年所接受的、有规导倾向的教育是如何影响自己其后的文学实践的,他的在朝与在野身份、或通达或偃蹇的仕履经历等对文学所产生的如影随形的影响,尤其值得考察。我们常以宋代的馆阁翰苑文人为例,研究他们在馆阁翰苑中进行的诗词唱和、书籍校勘等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其中不可忽略的背景即是,像馆阁翰苑等储才、备顾问之地,文人身处其中,唱和交游、应制备选等文事活动会带来文学上的趋同,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易留有相似的环境、意象与相似的特点;研究贬谪诗人也同样如此,一旦诗人被贬谪与流放,那么其谪人的身份以及特殊处境下的情绪,对其文学活动无疑也有所投射。研究这些具体情境下的文学内容就不能光分析作品,从而忽略写作主体的角色以及此角色带来的群体性或个体性的文学行为。

具体到本书所研究的宋代词科,须强调的是,词科相较于一般的科举科目,又有特殊性。它并非如常举科目单纯考量文才、政事或对儒学经义的理解,而更多的是为除授官员、张大国体这方面的应用而设,在实用性与实践性方面有更强烈的规导,这种规导在同样注重实用与实践性的四六文之上,找到了某一契合点,故而成为本书所揭示的制度与文学联结的一个典型案例。笔者认为,这些四六文作者背后的“身份”,通过这项科举制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的身份在从科举考生变为职业官僚之后,作为供职于翰苑掖垣的写作者,其写作上的直接变化是将之前的模拟文章真实地呈现出来,使文章的实用性与实践性得以变现。词科主要是为选拔词臣而设,对词学的考量与假拟